

變化中的文革記憶

◎ 徐 賁

中國發生文革至今已經四十年。對文革的記憶主要保存在那些中年以上的人們中間。對於這個年齡層以下的人們來說，文革的記憶已經十分淡漠。即使對那些中年以上的人們來說，他們的文革記憶也已經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基於共同生活經驗的集體記憶。相當一部分文革記憶正成為一種與個人經歷有關的、隨著個人生命終結而注定要消亡的個人記憶。歷史歲月的無情消逝，正在愈來愈緊迫地向我們提出關於文革集體記憶的問題。

在大眾傳媒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文革記憶正愈來愈呈現出複合式的新記憶特徵。文革記憶同時由當事人經歷的「真實歷史」和由傳媒（影視、印刷出版物、網絡文字、新聞報導、評論等等）所傳遞（mediated）的「人為歷史」所構成。在全球化的今天，新記憶的生成和維持不再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那樣，主要發生在中國的領土疆域內，它還發生在一個超國界的傳媒空間中。目前文革的許多記憶都是經由境外傳媒形式的出版和研究在保存著，這使得「經傳媒」，尤其是經全球傳媒的文革歷史成為當今文革記憶中至關重要的部分。這也使得我們有必要從一些新的特徵和形式去重新認識文革記憶的集體意義。

歷史記憶是社會文化成員通過文字或其他記載來獲得的。歷史記憶必須通過集體的公開活動，如慶典、節假紀念、學校歷史教學等等，才能定期激活，以保持新鮮。個人性的自傳記憶也必須藉由集體互動來保持。公眾場所的個人記憶因此特別有助於維繫集體記憶的關係，如親朋、婚姻、同學會、俱樂部關係等等。集體記憶對我們討論文革記憶特別具有意義，因為文革記憶的關鍵就是公眾性。無論是歷史記憶還是自傳記憶，文革集體記憶都必須依賴某種公共場所和公眾論壇，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接觸才能得以保存。文革記憶的公共場所，大至博物館、紀念活動、公共論壇、學術研究，小至家庭相處、朋友聚會、受難者間的定期活動，都是保持文革集體記憶的必要條件。記憶所涉及的不只是回憶的「能力」，而更是回憶的公眾權利和社會空間。不與他人相關、相聯繫的記憶是經不起時間消蝕的。而且，它無法被社會所保存，更無法表現為一種具有社會反思意義的集體行為¹。

堅持文革記憶首先就是要堅持歷史的當下性，有意義的歷史必須是被當下社會以社會正義為目的所集體記憶的歷史。從道義上說，集體記憶應當向過去的受難者或弱者傾斜，這就像一個正義社會的公共政策應當向社會弱者傾斜一樣。有道德和批判意義的集體記憶，它的基本問題意識就是如何避免在歷史中發生過的對弱者和易受傷害者的侵犯、損害和壓迫。

在文革記憶中，一向比較受重視的是實錄記憶。實錄記憶又稱「嚴肅記憶」，它強調記憶必須「真實」，一是要確實發生過，二是要準確無誤。因此，它倚重的只是歷史資料文獻。相比之下，較不受重視的是非實錄記憶。非實錄記憶往往以影視、文學作品、舊物收藏、消遣娛樂或者其他消費形式為表現形式，非實錄記憶也稱作為「通俗記憶」。從現有的文革記憶形式來看，嚴肅或實錄記憶和通俗或非實錄記憶之間存在的是一種連續變化的關係，不是一

種對立兩分的關係。在這裏，我要討論三種逐漸從「嚴肅」過渡到「通俗」的文革記憶，它們分別是虛擬文革博物館、講述文革故事和消遣娛樂的文革懷舊。由於嚴肅文革記憶空間遭到官方權力封殺，通俗形式對於維持文革記憶的作用就特別重要，通俗文革記憶本身的歷史特徵和局限也就愈發值得我們重視。

一 虛擬博物館的文革記憶

當今文革記憶中，網絡上的「虛擬文革博物館」和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資料索引光碟可以說是嚴肅記憶的兩個頗有代表意義的形式，它們都得力於全球傳媒的手段。網上的一些「文革博物館」其實是文革資料收集站，收集與文革有關的文獻和文章²。

網上的虛擬文革博物館是傳播和交流文革信息的重要手段。在國外，專門的歷史研究資源往往由學術科研中心和公共圖書館提供，系統性、學術規範、資料質量都比較有保障。在缺乏這種支持的情況下，文革資料網站只能是有甚麼就收集甚麼，資料的篩選標準和可靠性都還存在一些問題。即使如此，文革資料網站仍然是關心文革的人一個極寶貴的資訊渠道。

作為資訊渠道的虛擬博物館與真正的博物館對於集體記憶的作用是不同的。網絡資訊在性質上是一種混合體，它的訊息以文字為基礎，故有印刷媒體的特性。它同時以網絡傳送，因而有點像有線電視；使用者根據自己的興趣或需要對信息作個別選擇，信息因而具有私人性質。博物館則不同，博物館展覽以實物為主，文字只是輔助。在博物館的基本工作項目如收集、保管、研究和陳列中，陳列是最重要的，因為陳列直接面對公眾，將歷史轉化為與他們當下的共同需要和經驗相關的形象記憶。博物館每一次陳列都必然是從某種公共性主題設計的，儘管訪問者可以對陳列作出不同的個別解釋，但他們與同一陳列的接觸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主題引導。公共記憶的設施、活動和場合，如歷史建築物、紀念碑、慶典儀式、公共節目，包括博物館，所起到的都是這樣一種集體記憶引導作用。博物館是一個眾人聚集、可以面對面交流共同經驗的公共場所，即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那種實在的「公共空間」。這個作用是網絡上單純個人訪問的虛擬博物館所無法起到的。

虛擬博物館另一個無法起到的作用是提供物質性的歷史感。實物保存對於集體記憶想像和再現歷史至關重要。博物館的歷史陳列不是教科書，它不是單純用文字來敘述歷史，而是用歷史文物和必要的文字輔助材料來形象地再現歷史。設想，文革博物館中收藏了某一位文革受害者的《改造日記》，儘管人們已經熟悉了這日記的文字內容，他們在參觀博物館時，仍然會因目睹那個實實在在的筆記本和上面的字跡而感受到歷史見證人的震撼。

在博物館陳列中，文字形成集體記憶的效果其實是很不直接的。閱讀是一種個體性的信息接受，公眾不可能同時以同樣速度閱讀同一文本。一個文本要造成眾人同時接受、共同反應的公眾效果，必須借助聲音的媒介，如當事人的自述錄音或者人聲朗讀等等。這也就是演說的效果。聽演說和讀演說詞是不同的。在博物館裏，許多人可以在同一個空間中同時看實物陳列，共同的注視有合眾為群的效果，這就和在球場上身臨其境比在電視機前看球賽遠遠更有集體感覺一樣。

網上文革資料庫的收藏具有雜合的性質，相比之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更投注於收集史實性質的「資料文獻」。文庫光碟收集一萬篇以上的原始文件，總字數接近三千萬。文庫分為七個部分，從中央文件、毛、林和其他首長講話、指示到報刊社論、紅衛兵、造反

派文獻，再到「異端思潮」文獻。光碟可以用作者、篇名、日期、主題詞等方便檢索。歷史研究者和一般關心文革者都可以拿它作為一個私人資料庫。《文革文庫》的史料本身並不代表文革記憶，它只是一種形成記憶的中介資源和推動力量。《文革文庫》把文革資料從受管制的歷史存放處（資料館、圖書館、博物館）便捷地轉移到每一個使用者手裏，在歷史和記憶之間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文革文庫》的編輯目的是讓歷史資料激活對文革的當下記憶。割斷歷史和當下聯繫的常見手法就是把歷史材料「檔案化」。檔案由專門權力機關集中管理和控制，限制在專門人群範圍之內使用，設有特殊申請使用程序，或者索性以「保密」為由加以封存。以保護歷史的名義把歷史從普通人的當下生活中隔離出去，在過去傳媒不發達時是不難做到的事情。無論是誰，不到官方控制的圖書館、檔案所，不經過官方嚴格規定的批准手續，永遠不可能一下子接觸許多歷史材料。但是，在傳媒發達的今天，一張小小的光碟就能把三千多萬字的歷史材料放到你的案頭。它的作用比起徒具記憶設施形式的檔案館可要大得多。

把歷史材料公諸於世，使之成為公共信息，這是歷史和當下聯繫，歷史進入公共記憶的第一步。這種公共記憶的重要功能在於前史之鑑，今世不忘，只有今世不忘，才能有後世不忘。當下歷史不僅是要問該記住哪些歷史事件，而且要問為甚麼要記住這些事件。因此，回想過去（remember）不單單是「追溯歷史」（go back to history），而更是名副其實的「歷史思考」（historicize）。把不變的、死了的歷史轉化為注入當下問題意識的過去回想，這種歷史思考才能幫助歷史成為不斷被激活、不斷產生新意義的動態過程。

文革記憶必須包含「為甚麼要記住文革」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文革文庫》編者的回答是，記住文革是為了防止文革的專制極權在中國重演。以文庫的性質來看，這個回答是確切的。但是，記憶文革並不總是與記憶文革的專制暴政的問題意識聯繫在一起。許多文革記憶形式，如文革文物收藏、吃毛家菜、唱樣板戲、觀賞新版的「紅色經典」，或者訪問娛樂公園式的「文革博物館」，其實都不一定帶有這樣的問題意識。個人有選擇記憶目的的自由，但不同性質的個人選擇並不具有同等的群體構建作用。反思文革專制暴政記憶之所以比其他形式的文革記憶來得重要，是就它防止未來專制暴政的群體構建作用來說的。這種記憶不只是在與遺忘抗爭，而且更是在與其他記憶的爭奪中才被確立的。

網上或電子傳媒所提供的文革記憶是目前最具嚴肅記憶特徵的。這些記憶的最大局限性在於它們缺乏與之相襯的公共生活場所。它們的發生往往是個體性的，尚無法轉變為一種公共生活中的集體體驗。在大眾傳媒時代，身臨其境的集體體驗愈來愈被傳媒體驗所代替，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評所擔憂的那種將社會成員去集體化和個人原子化的效果。就營造集體體驗而言，再完備的文革資料收集，再方便的檢索技術，都無法代替一個作為公共記憶空間的博物館。文革資料文庫其實是一再地在提醒人們，當今中國是多麼需要這樣一個公共空間。說到底，技術性的資料收集只是激活歷史和保存集體記憶的輔助手段。資料只是歷史的記錄，但資料並不就等於集體記憶。在個人案頭使用的電腦不可能代替博物館。像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和赤柬暴行館這樣的博物館，它們是一種在經歷了人性劫難後，幫助人們社會交往和自我教育的公共空間。許多關於大屠殺博物館的研究都指出，到大屠殺博物館參觀的很多都是學生（作為社會或歷史課教育的一部分）。學生訪問者在大屠殺博物館中與其他訪問者一起形成與人類災難和政治邪惡意識有關的人際聯繫，結成這種人際聯繫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譴責非正義的集體表態形式。

二 說故事的文革記憶

不與他人聯繫的個人記憶是經不起時間消蝕的，它無法被社會所保存，更無法表現為一種具有社會公共意義的記憶研究對象。集體記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集體的經驗和經由集體傳遞的經驗才具有連貫性和持久性。集體記憶指的是「一個社會保留或丟失關於它過去的信息」³。最頑強地保存文革個人記憶的是那些在文革中遭遇最悲慘、苦難經歷最深切的人們。他們大多是文革時已經是中年以上的人。這些當時四五十歲以上的人現在已經年邁或已逝去。即使那些存活至今的，也很難在完全孤獨的狀態下保留「栩栩如生」的記憶。許多人把記憶設想為一種圖像、景象或印象的保存，而圖像、景象和印象的保留恰恰是最經不起時間消蝕的。比保存形象遠為有效，也遠為常用的記憶保存方式是說故事。顧名思義，說故事就是敘述往事。為了保存對文革的記憶，個體記憶者必須對別人，或者至少對他的親人和他自己講述他的文革經歷。

文革記憶的「故事性質」在文革1976年結束後近三十年的今天變得更為突出。不僅當事者的記憶必須以敘述來維持，而且當事者的經歷也只有經由敘述方能為下一輩所了解。由於文革檔案的官方管制以及許多人物和事件公開言說的禁忌，文革記憶在極大程度上只得依賴「故事」敘述。故事敘述可以是紀實或虛構的，也可以是這二者的某種混合。故事可以通過口耳相傳，也可以通過文學或影視。

今天，以各種故事形式出現的集體性文革記憶，與二十多年前（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集體性文革記憶就很不相同。首先，二十多年前的個人記憶由尚為新鮮的共同生活經驗幾乎自然而然地形成集體記憶。今天，個人記憶必須經由傳媒，顯現出前所未有的非直接性特徵。其次，這種新的傳媒化集體記憶的「集體」發生了變化。二十多年前，這個「集體」幾乎毫無疑問是中國疆域範圍內的人們。但是，今天的「集體」，就傳媒記憶所涉及的範圍而言，已經是跨越了疆域性國界，在國內外的華人甚至非華人中保存著。中國國內的故事敘述受到遠比在境外要嚴格的限制，故事敘述在境外發生反倒超過了境內。

各種在國外敘述的文革故事之所以吸引讀者，首先是因為它們是關於文革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文革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像猶太人大屠殺那樣的「獨一無二」性質的事件。有影響的文革敘述有各種形式，如人物傳記（如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個人紀實回憶（如巫寧坤的《一滴淚》和鄭念的《上海生與死》）、文藝作品（如閔安琪在美國出版的《紅杜鵑》[Red Azalea]和戴思潔在法國出版的《巴爾扎克和中國的小女裁縫》[Balzac and the Little Seamstress]）、電影作品（如《藍風箏》、《活著》、《霸王別姬》）和電視記錄片（如《八、九點鐘的太陽》和由American Productions製作的《毛的時代》[The Mao Years]）。這些故事敘述都在不斷維持著人們對文革的關注和思考。它們成為當今世界各地華人對文革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出現在國外，在國外擁有大量讀者，並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吸引國內讀者，促使文革集體記憶改變二十多年前的那種被國界所限的「集體」概念，使文革敘述和記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特徵。

記憶必須符合歷史，但記憶卻又不等於歷史。常常有人以歷史「事實細節」的名義攻擊他們不喜歡的別人記憶，所使用的便是混淆歷史和記憶的策略。他們同時扮演歷史警察和意識形態警察的角色。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就曾遭受過許多這樣的攻擊。例如，曾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小組成員的王新德醫生對李志綏的書痛加撻伐，稱自己必須「還歷史一個清楚與明白」。王新德說：「我是（毛澤東）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我清楚

根本就沒有宣布過李志綏是醫療組組長。……李志綏那本書很多是假的，胡說八道，我看過。」⁴李志綏和他的讀者記憶中的毛澤東是一個在文革中玩盡權術，主導了文革全過程，至死不肯稍微放鬆手中專制權力的政治人物。就算李志綏真的不是第二次醫療組的組長，王醫生抓住這一破綻是為了還毛澤東一個怎樣的「歷史清白」呢？是把毛澤東記憶為一個終生為人民謀利益，不為個人謀權力的「大救星」？還是記憶為一個受「四人幫」一時欺騙，最終無須為文革負責的「英明領袖」？透視故事敘述記憶和核查其中的歷史事實細節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故事敘述記憶的靈魂是「對錯」和「是非」，而核查歷史細節則可以只與「知識」有關。

對於形成集體歷史記憶來說，紀實的或文學虛構的故事敘述所起的作用並沒有甚麼不同。紀實或虛構之間只有敘述策略和形式的不同，沒有必然的真實和非真實的本質區別。再「真實」的歷史敘述也不可能再現所有的歷史事實，它必然是選擇性的敘述。敘述某些事實而隱去另一些事實，這本身就是一種用選擇來虛構的敘述。故事敘述的記憶恰恰和自稱為「真理」的歷史有所區別。正如安德森（Steve Anderson）所指出的，那些包含在故事敘述（影視的或文字的）中的通俗記憶，「它的力量和重要性是在與『官方』歷史所不同的靈活性和難以捉摸中比較出來的。在個人和人群中存活下來的記憶往往和在文化或政府制度中自上而下發布的歷史話語有所抵觸。」⁵《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因與制度中歷史話語的抵觸而遭官方禁忌，李醫生的記憶不只涉及了已經作古的歷史人物毛澤東，更涉及了一個政權和一種政治形態在當下的合法性。記憶的政治性使得記憶不能不成為權力意識形態爭奪和嚴格管制的對象。

通俗記憶和官方記憶往往交織在一起，幾乎不可能形成與國家遺忘針鋒相對的純正人民記憶。通俗記憶一直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中既受權力影響，又與它有所區別的情況下形成和變化著的。許子東在《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中涉及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從許子東的分析中，陳彥讀出的是文革小說以記憶名義對文革實行的忘卻。陳彥認為，「相當多的是中國80年代的獲獎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有著廣大的讀者擁戴，而且受到官方的認可」，官方與民間對文革詮釋的一致，表明了在中國不存在一種「與文革災難相稱」的獨立反思。他的結論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形成的集體記憶並非集體記憶，毋寧說這是強加的記憶，是統治者的記憶，是一黨極權的記憶。」⁶

陳彥的批評很有見地。但是，也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我們真的可能從本質上去區分「集體記憶」和「非集體記憶」嗎？被扭曲的、被強加的集體記憶不同樣也是一種集體記憶嗎？集體記憶不是因此才成為不同記憶方式的爭奪對象嗎？其實，記憶的對立面不一定就是忘卻，而可能是其他不同的記憶。每一種記憶都包括著相應的忘卻，記憶因此才成為一種爭奪中的，由當下需要所導向的歷史意識。

隨著人們當下問題意識和當下環境因素的改變，集體記憶也在不斷變動之中。集體記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它總是一個不斷再記憶的過程，「記憶在時間流程中並非停滯不變，記憶在不斷重新形成和重新展現的過程之中，淡忘了，又再被改編。即使某個（記憶中的）形象可以凝固某個事件，那個形象的意義卻不斷隨環境因素的變化而作出改變。」⁷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文革集體記憶一直處在變化之中。從一開始的對林彪和「四人幫」的妖魔化，到80年代初的「傷痕」和「反思」，到80年代後期的「文化熱」，再到90年代的普遍淡忘、「陽光燦爛的日子」式的懷念和商業、娛樂化懷舊，文革集體記憶的主要表現內容和表現形式始終是總體政治、社會環境的一部分。作為集體記憶的說故事同樣受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的制

約，同樣也在變化。

將不同的集體記憶確認為不同的集體記憶，並不意味著放棄對它們的價值判斷。脫離價值判斷的理解必然會落入單純描述性的功能主義分析，結果變成無原則地接受一切現有的記憶形式。價值判斷的關鍵在於甚麼是判斷的價值。我們可以為此提出「真實」的價值，真實的價值要求我們面對文革中人們的真實苦難（暴力、恐懼、肉體折磨、精神折磨、人性扭曲等等），弄清文革災難的真正政治、社會制度原因，確定文革罪惡的真正性質，追究真正應當為文革擔負罪責的人員等等。有了真實的價值，我們才有可能把提出文革實質問題的記憶和躲避、遮掩甚至否認文革實質問題的記憶區分開來。真正的文革記憶必然是以社會正義為問題意識的記憶，必然具有對文革普通受害者的道義關注。從這個正義標準來看，王友琴紀念文革中平凡人悲慘遭遇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和為林彪、吳法憲等人翻案的《重審林彪罪案》（丁凱文主編）就有著很大的差別。

儘管人們可能對現有的文革小說或電影及其意識形態傾向有不同的看法和保留意見，但是，請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文革故事敘述，那麼今天或後世的中國人對文革的記憶是會更多一點呢，還是更少一點？不少當年文革故事的作者已經作古，那些還活著的作家也早已不在中國講述文革的故事。只要比較一下二十多年前和今天文壇上講述的故事，我們大概可以同意，真的已經到了該重新珍視文革老故事的時候了。

三 消遣娛樂和商業化的文革懷舊記憶

當中國社會的發展愈來愈遠離文革時代，不斷出現新的社會現象和問題的時候，文革記憶對文革的不同闡釋就會愈來愈具多樣性和互相矛盾性。這種情況是由記憶本身必然包含的現刻性和當下性所決定的。文革記憶不僅涉及「文革中發生過甚麼事情」，而且還涉及「哪些是今天仍有意義的事情」。三十年前，亂世初定，大多數人經過了十年的動蕩、匱乏、恐懼和焦慮，人心思變成為當時現刻與過去的主要意義聯繫。三十年後的今天，社會經濟物質和大眾文化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同的人對這些變化的實質意義判斷也就必然表現為不同的文革記憶。這些判斷大都建立在某種今昔聯繫或今昔對比之上。不同的記憶包含對文革的不同追想，而不同的文革追想則包含對文革政治、社會意義的不同認識和不同判斷。

文革懷舊是一種對文革的追想，但它是一種去除了政治、社會意義的文革追想。它的主要特徵是記憶的個人化、瑣屑化、玩物化和頹廢化。許多個人的文革回憶帶有明顯的回顧和懷舊色彩，是一種個人「尋蹤」式懷舊。強調懷舊的個人性質，不是說它總表現為一個人的獨思，而是說它同當今官方的文革「公共記憶」（「四人幫」作亂）之間有根本性質的差異。事實上，個人性質的文革懷舊總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某種公眾形式出現。個人回憶的公開出版就是一種。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在書店裏一下子賣到脫銷，就證明了她的個人回憶引起了極大的公眾迴響。老三屆學生的各種聚會也是一種懷舊的公眾形式。俄國作家楊克列維奇（Vladimir Yankelevitch）曾把懷舊稱作是「與自己重逢」⁸。這種懷舊往往充滿了自嘲和無奈。

懷舊中當然還有那種並不自嘲，也並不無奈的。今天，經常可以看到高唱文革時期革命歌曲和樣板戲的中年人群，嚴肅和投入的神情宛如時空倒轉。王家平指出：「自90年代以來，以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和一百一十周年為契機，在社會分配格局中處於弱勢地位的群眾（主要是廣大的下崗工人和未能富裕起來的農民）頻頻緬懷起文革時代的『公平』生活來，……成為

『新左派』思潮的社會基礎。」王家平還特別提到了「新左派」藝術家張廣天「革命劇作」中的紅衛兵情結和他關於文革的言論，認為張廣天的文革故事和文革文物一樣，已經成為「一種促銷自己、獲得利益的手段」⁹。在那些並不自嘲和並不無奈的文革懷舊中包含著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因素，其中包括懷舊者對現實生活和處境的看法、對是否須要反思文革（包括懺悔）的判斷，也包括文革思維方式對當今人們思想的持續影響。這些都使得文革懷舊有別於一般的懷舊，而成為一種特定類型的懷舊。

懷舊是有欠缺的記憶。懷舊的悲哀在於擔心失憶，卻又無法真正記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就此寫道¹⁰：

在追尋、挽救和宏揚集體記憶時，不再關注特定事件，而著眼於漫長的過去，……普通公眾對歷史的看法也發生了突變，他們時時擔憂在集體失憶中喪失記憶。這種擔憂極為生硬地表現為對過去時尚的喜好。記憶因此成為不擇手段的懷舊商販極易下手的對象。記憶也成為商品社會中的暢銷物品。

懷舊一旦代替了記憶，其結果必然是記憶的商品化和即刻消費化。文革懷舊的商品化和即刻消費化正是90年代以後文革記憶大眾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文革懷舊也因此呈現出玩物化、瑣屑化和頹廢化的特徵。文革生活經驗和文革見證實物被從原來的政治和社會意義環境中分離出來，要麼變成純粹的「文物」或「收藏品」（毛像章、郵票、宣傳畫），要麼變為即刻消費的商品（毛家菜、知青飯店、毛故居旅遊、帶毛頭像的T恤），再不然就變成現代迷信的崇拜偶像（祈福去邪的毛頭像）。

現有的文革懷舊幾乎全部局限在實地實物記憶，這一部分記憶與政治敏感度高、反思批判性強的事件記憶和人物記憶的聯繫幾乎完全隔裂。商業化、娛樂化趨向（包括商業性的「文革博物館」）的文革懷舊把文革當作消費對象，而不是反思對象。它消費的是由市場所提供的各種商品：旅遊商品、收藏商品、娛樂商品，形成了所謂的「紅色旅遊」、「文革文物收藏」和「紅色經典」。文革懷舊是一種「物化」的記憶，它對文革的一些實物實地有興趣，但這興趣僅限於實物實地的商業和娛樂價值，不涉及它們背後的政治、社會事件意義。例如，「文革文物」收藏已在近幾年來成為一種新的貨幣保值或投資對象，從毛像章、語錄本、宣傳畫、宣傳品、票證、文革郵票、瓷器到雜件，文革收藏已成為自成一類類的「文革文物」，在全國不少城市有固定的市場進行交易。

商業和娛樂消遣性懷舊對文革記憶的最大危險在於，它有可能把文革記憶變成一種無實質社會問題和無社會正義意識的記憶，變成一種對歷史苦難、人性墮落和道德是非無動於衷的輕鬆隨想。休伊森（Robert Hewison）曾告誡道：「不應當把懷舊誤當作真正的歷史回想。懷舊……讓人擺脫不快的往事和自我，變得自鳴得意。」¹¹娛樂公園中的「文革博物館」不但使我們為自己人性墮落的過去害羞，反而讓我們為現今的「文化事業成就」感到驕傲。這種沒有正義是非感的記憶對統治權力是安全的，它起到的是文革記憶安全閥的作用。這是文革懷舊最常見的負面作用，「（懷舊）是人們在喪失基本價值時應付失望和沮喪的安全閥」¹²。有論者甚至稱懷舊是一種「疾病」，「人們懷舊，這不是表示他們覺得今天的生活很痛苦，很可怕，而是表示他們覺得今天的生活根本沒有特色，沉悶乏味，一片空白。生活沒有活力，沒有希望，也沒有未來。……這是一個不知何去何從的時代，一個除了投向過去，無法想像未來能實現甚麼的時代。」¹³

在那些商業性的文革懷舊中，市場的力量正在協助官方權力完成了對文革的去政治化和去意

識形態化。文革物品成為有價的物品，甚至成為富有「審美特徵」、「藝術價值」和「民族傳統特色」的歷史文物。經過漂白美化的文革物品抹掉身上的專制統治印記，幫助營造一個無害文革的神話。文革文物收藏可以幫助保存文革時期的歷史證物，防止它們進一步的散失。保存歷史證物是保存歷史記憶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今後社會、政治、文化性的歷史研究會有所幫助。但是，僅僅通過文物市場和娛樂公園式物品展覽來保存文革證物，卻可能造成一種關於文革的膚淺而有害的公共意識。

從政治、社會和人性的災難去認識文革，只有在自由社會的公共政治空間中才有可能。人們需要有開放的討論、研究、不受權力限制的歷史教育、博物館、公共論壇和各種反思、紀念形式。唯有如此，自由的文革討論才能有制度的保證條件。在自由公共空間中被展現的軍用皮帶將不再是文物市場上的有價商品或者歷史清白的紀念品，而是一件殘害過活生生受難者的凶器。那些品類繁多的「毛頭像」也不是甚麼製作精美的工藝品，而是千千萬萬副套在人們身上的思想枷鎖。純商業化的文革文物收藏和展示，它的記憶局限不在於其通俗形式，而在於它抽掉了文革物品中人的苦難因素，成為一種麻木不仁的物化記憶。其實，和別的文革通俗記憶形式（文學、影視、傳記等等）一樣，只要有了自由反思和公共討論的大環境，文革文物收藏和展示同樣可以揭示文革苦難、殘暴、恐懼和人性毀滅，同樣可以表達對文革罪行的是非正義判斷。

通俗文革記憶在當今中國的特定環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把文革還給普通民眾的作用。文化精英排斥通俗文革記憶，這並不有利於在當前保存文革記憶。通俗文革記憶的意義並不在於它準確地「記住」一些專業歷史學家才會看重的「事實」，而在於它的敘事和傳遞形式能引起人們的不同當下興趣（娛樂、審美、知識、歷史），因而擴大了關心文革的人群。由於通俗文革記憶的極為突出的當下性，它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狀態中。通俗文革記憶可以說是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的時代新記憶。新記憶是相對於文革剛結束之後的舊記憶而言的。舊記憶可以從集體性的文革經驗直接獲得，新記憶則需要從故事、影視、物品收藏和展示等等中去拼合和透視，這些材料既包含不同的文革記憶，又是進一步形成文革記憶的再生資源。通俗記憶特別表現出文革記憶的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文革記憶不是一次完成的，那些看似膚淺的記憶可以被用作再記憶的材料。專制意識形態控制在膚淺記憶上留下了歷史痕跡，它本身就是文革和文革後餘毒的遺痕，它本身就需要在今後的文革再記憶中被考慮進去。

註釋

- 1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3-24.
- 2 網上文革博物館如Virtual Museum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ww.cnd.org/CR/ha11s.htm1)。資料索引光碟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者稱：「在史料彙編方面完成了一個研究性和資料性並舉的『文革博物館』。」
- 3 Barry Schwartz cited in Ronald J. Berger, *Constructing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 Life History of Two Brothers' Survival* (Niwot, CO: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ress, 1995), 1.
- 4 余瑋、吳志菲、斯佳：〈看似神秘卻平淡——「紅牆醫生」王新德細訴偉人身邊事〉（www.snweb.com/gb/dadi/2003/02/a0220014.htm）。

- 5 Steve Anderson, "History TV and Popular Memory", in *Television Histories: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Media Age*, ed. Gary R. Edgerton and Peter C. Rollins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1), 22.
- 6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台北：麥田出版，2000）；陳彥：〈文革記憶與中華民族的再生——評許子東新著《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www.bjzc.org/bjs/bc/94/77）。
- 7 Marita Sturken, *Tangled Memories: The Vietnam War, the AIDS Epidemic, and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7.
- 8 Vladimir Yankelevitch, *L'Irreversible et la nostalgie* (Paris: Glammation, 1974), 302.
- 9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詩歌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324。
- 10 Jacques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95.
- 11 Robert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 1987), 46.
- 12 Fred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105.
- 13 Michael Wood, "Nostalgia or Never: You Can't Go Home Again", *New Society* 30, no. 631 (7 November 1974): 344.

徐 賁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總第九十三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